

# 芦荔村的新“稻”路

■ 叶荣荣(黄山)

## 安凌水稻看芦荔

车子上了德上高速，一路向南，于碧山绿水间飞驰，驶入黄山祁门境内。祁门，森林覆盖率88.64%，全国百佳深呼吸小城，世界三大高香名茶祁红的故乡。

“哦，神奇的祁红！”来到这里，人们总是情不自禁地赞叹。

“可别光盯着祁红，‘祁遇十八乡’，每个乡镇都有拿得出手的看家货。”这句话立即“引爆”车厢，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祁门下辖10镇8乡，近年通过整合各自特色资源，诸如平里镇的祁红、金字牌镇的瓷器、闪里镇的门连戏、历口镇的御医、大坦乡的草药和蛇药……聚力创建全域旅游联动发展的新模式。“祁遇十八乡”便是应运而生的文旅融合品牌。

车子从安凌镇出口驶出。安凌镇，自古就是官家屯军屯田之地，被誉为“祁门粮仓”。2023年获评全省粮食生产先进乡镇，2024年粮食产值达到3000万元。

“祁遇稻田”，耸立在金黄的稻海之中，明晃晃地亮眼。祁门水稻看安凌，安凌水稻看芦荔。芦荔村第九批驻村第一书记汪建设早早就在村口会客厅——白鹞山野食堂迎接我们。我们只是转了一圈，居高扫了几眼，就被芦荔惊诧到了。农耕与现代，山野与文明，淳朴与诗意，稻田与文旅，就这样一览无遗。

## 耕地曾大面积撂荒

种粮，在芦荔是祖传的基业。村党支部书记张建龙自豪又不乏感慨。芦荔的种粮路，其实并不是一帆风顺。

1981年，芦荔村包产到户，粮食产量蹭蹭上涨。年轻的村民桂正元还被县里选中赴海南向袁隆平学习杂交水稻种植技术。一张1991年由县政府颁发的奖状记载了那个时

期的荣光，学成归来的桂正元和其他五人推广的芦荔杂交稻制种基地建设项目被评为县级优秀科技成果奖。那个年代的芦荔，种粮是甜蜜的。

“好景不长啊，随之而来的打工潮，猛烈冲击着芦荔的水稻种植，几乎是一扫而空。”

“谷贱伤农吧？”

“打工的收益是种粮没法比的，耕地撂荒就像传染病般蔓延扩散。我家当时共有六百九分地，其中二亩四分地撂荒，全村估摸撂荒五六百亩。凤凰岭是最早外出打工的村民组，耕地全部抛荒，竟无一户耕田。”说起曾经的惨淡，张建龙仍深感痛心。

大山深处的芦荔村，除了水稻也无其他富民的产业，日子越来越难。

“最穷的时候，村集体年收入不足1万元。”芦荔村进入了贫困村行列。

## 梦是可以有的

张建龙也不能守着耕地过穷日子，迫于生计，走南闯北做起了木材生意。回想起来，这段经历带给他的最大收获并不是赚钱养家，而是意外地认识到种粮能致富，关键是怎么种！

2011年，张建龙在全县率先流转闲置耕地200亩，尝试适度规模化经营，机械化种植水稻，当年实现纯收益18万元。一个芦荔村的种粮梦在张建龙的心底埋下了种子。

2018年张建龙开始担任村党支部副书记，为壮大集体经济做了很多尝试，收益好像都还不错，可这都不是张建龙心里的梦。

2019年，张建龙又在村里流转了194亩耕地，并购置了第一组烘干机，解决了晒粮难题。2021年，他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劝说村民张记能一起干，流转了404亩耕地，种植了3个品种的大米，又上了2组烘干机。当年仅粮食烘干的收入就达到10万元，躺在村集体的账本上，张建龙心里敞亮敞亮的，梦一下子就长大了。他觉得条件成熟了，将撰写的《关于芦荔村发展水稻种植业的调研报告》递交给有

关部门。所有与之相关的人，都在苦苦思索一条强村富民的新“稻”路。

## 1+6+X

这条路，穿旧鞋肯定走不通。张建龙提议，粮食产业要做大做强，各村必须摒弃内卷，抱团发展，分工协作，劲往一处使。

安凌镇与时俱进，因地制宜，把各村聚成一盘棋，构筑粮食产业链条，构建“1+6+X”全新发展模式。

“1是安凌镇党委领航推动；6是芦荔、琅丰、星星、星联、广联、王蒲等第一批试点村协作发展；X为新增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新型经营主体、种粮大户等共同参与。”安凌镇党委书记陈艳把抽象的数字符号变成了具体的主体举措。

“谁来种粮？”“村集体+合作社+种植大户+农户”的种植模式被迅速推广。

“怎么种粮？”抱团成立粮食联盟，实行统一规划、统一机耕、统一技术、统一品牌、统一销售，分户管理，引导各村精准参与产业链分工。

“种粮怎样才能有利可图？”芦荔村实现育秧、插播、防涝、机收、烘干全程作业机械化，对种子、化肥、农药统一采买，每亩成本只有1190元，较之人工作业下降20%以上。精耕细作，科学施肥，提升亩产量和出米率。提高收购价，合作社以高出市场价每斤0.2元至0.3元的价格购入稻谷，大户每亩收益700元，普通农户也达到了500多元。种粮大户张记能作了比较，这样种地，每年的纯利润比之前至少高出了5万元。

## 芦荔大米有点甜

水稻种植产业的路通了，如何才能越走越宽？

宽敞的粮食烘干厂房内，烘干机从1组增加到4组，能源由煤改电，手工操作改进为手机操控，日均烘干粮食12万斤。从烘干机引出的传送带犹如天桥飞架，将干爽的稻粒直接运送到能储存350吨粮食的周转仓。日包装

2000袋大米的精包装车间和5吨大米保鲜库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高标准的大米加工厂也在加紧筹建，芦荔大米进商超为期不远。

“必须要延长完备粮食产业链条，形成一个闭环，加快推进精细加工，实现卖稻谷到卖大米的转变，把更多的增值效益留在本地、留给农民。”张建龙为这个答案作了精准概括。

周转仓内，刚刚脱穗的谷粒细长匀称，优质品种“玉针香”清香扑鼻。“芦荔水稻引用山泉水灌溉，采用传统晚稻耕种方式，6月育秧，7月栽秧，10月底机收，稻谷生长周期长达140天。人工砍田畈，田间除草，以紫云英为绿肥，搭配少量生态农药，这才成就了‘米粒均匀、如珠似玉、米饭芳香、清淡微甜’的芦荔大米品质。”

通过科学发展水稻种植产业以及统筹油菜、中药材、食用菌、蔬菜等其他农作物种植，芦荔村集体经济收入由2020年的50.3万元跃升至2024年的209.9万元，高出安凌镇各村平均数1倍多。

稻香谷丰，“一村一品”这篇粮文章在芦荔大地上被浓墨重彩地书写。

## 种田人的新风貌

与此同时，另一篇文章也开始大张旗鼓提笔写下了序篇。

蓝天之下，稻浪之间，游客参与农事劳作，体验插秧播种、品尝乡村美食。层出不穷的系列文娱策划，推动农文旅融合从简单的观光打卡向深度的体验体悟转变。稻鱼共养，青醒酒店、柴板基地、张荣桥院士名人效应观星台正在谋划推进，吃住娱学养一体化的新空间即将成形。

2024年至今，芦荔村游客接待量超过了1万人次，产生经济收益20余万元。“祁遇稻田”成功入选安徽文旅“三新”优秀案例。

宽阔平坦的德上高速无尽地延伸，车子加足马力欢快飞奔。

群山昂首，闻江激荡。回头望，稻菽千重浪，芦荔起苍黄。



红坪古村。郑宏 摄

# 徽州有条“税务上顶”大街

■ 张立旺(黄山)

发票，在清朝和民国时期有很多称谓，其中“发奉”最为流行，意为“发出奉上”，有谦恭和儒雅之意。黄山市徽州税文化博物馆就展示着民国时期“老凤祥”开具的4张“发奉”。这是“老凤祥”自印的销货发票，发票上半部分印制的“徽州税务上顶大街 老凤祥金珠铺”大有来头。

徽州，古称新安、歙州等，官府驻地在今天黄山市歙县古城内，自秦置县以来，已有2200多年历史，是徽商故里，又是徽文化的重要发源地。百年老店“老凤祥”将分店开进徽州府所在地“税务上顶”大街，佐证了当时徽州古城街道的繁华热闹。

“税务上顶”大街在歙县古城区域中和街的最东段，处在大北街、中和街及中山巷的交汇地带。把“税务”之名用于一条如此重要的街道，有着一段历史渊源。

《歙县民间艺术》刊载这样一个传奇故事：

北宋宣和年间，齐云山道士张真乙自称窥得天机，向宋徽宗密报歙州将出反王。徽宗命其处置。张真乙夜观星象，自圣殿盗取石鼓钤于龙颈七寸，悬赏千两求播鼓人——实则暗藏毒计：敲响则播鼓者必是“新君”转世。

观者众但石鼓无人播响。某日，男童方腊随母路过，讥讽石鼓之局：“石片敲石片才响，木槌击石鼓岂能发声？”说罢飞踢石鼓扬长而去。张真乙掐算方知错失其人。

樵夫方有望贪千两赏银，携方腊幼弟方蜜试播。八岁孩童随手一击，石鼓

竟发“咚”声。张真乙假意诱其续播，方蜜等人终血溅鼓前。

数年后，方腊率众起义。传说方腊起事前夜，百姓已砸碎石鼓泄愤，唯留“石鼓响鼎”之地名。因旧址高踞街市，后世渐讹传为“石鼓响顶”。

民间故事，取一点因由，点染夸大，但反映了百姓鲜明的爱憎。

“石鼓响顶”又怎么叫成“税务上顶”了呢？

根据许承尧著《歙县志》记载，宋税课司设于“大北街口之南”，即大北街、中和街及中山巷的交汇地带，也就是今天的税务上顶大街所在地。南宋嘉熙庚子年间，废黜了此处税课司。元、明两代又在此重设税务机构。明朝弘治十四年毁于火，随后进行重建，不久又废置了。

据徽学专家张艳红介绍，废止后的税务机构转让给一位汪姓商人长期用于开办商号，直至1976年，歙县税务局在此设税务所。有的研究人员认为，是当地人常提到“税务”二字，久而久之，人们就把这一段街道习惯地称为“税务上顶”。

《歙县民间艺术》记载的，是街道命名与历史人物的传奇故事，符合中国传统命名的典型模式，但没有说到“税务上顶”。引用许承尧著《歙县志》记载的，是简单的推理性结论，只能说明这条街道上长期设置过“税务”机构。而徽州税文化博物馆展示的这张发票却实实在证明了“税务上顶”在民国时期的真实存在。

笔者研究发现，在与歙县本地人沟通时，他们无论是说“石鼓响鼎”“石鼓响

顶”或“石鼓上鼎”“石鼓上顶”，其发音无法区分，其中“上”就是“响”的发音。“石鼓”和“税务”的发音也非常接近，外地人听来几乎一模一样。而且徽州人擅长建房和雕刻，古民居和歙砚等雕刻驰名海内外，为使“四梁八柱”的落地支撑木柱子不潮湿腐烂，在柱脚下部都垫上一块雕刻如大鼓式的石墩，不仅防潮，还能加强柱基的承压力。这种大鼓式的石墩，在学术界称为柱础，俗称碌盘，歙县方言称为“石鼓”。

这两件事情看似不相干，综合分析却不难得出结论：处在大北街、中和街及中山巷的交汇地带的中和街最东段，原来可能是当地有名的“石鼓”雕刻、交易和存放的地方，日常免不了人来人往，敲敲打打，所以老百姓口口相传“石鼓响鼎”。而此处又是中和街由低向高上坡至地势最高处，且“顶”比“鼎”通用易辨认和方便书写，“上”比“响”同样通用易辨认和方便书写，也就有了“石鼓上顶”的以讹传讹。笔者这种结论说法也得到了当地专家的认可。

这张写有“税务上顶大街”的“发奉”静静沉睡在玻璃展柜中，将四百年前的市声凝固在宣纸上、在时光里。它不仅记录了极具特色的街道名称，还记录了徽州人历来通过口口相传，坚持诚信纳税的优良传统。商脉绵长，石鼓声声，见证着这片土地的繁华与诚信。



一本标注“国学典藏”的《西厢记》点校本，300余处硬伤赫然在目，从人名错讹到年代混淆，从评语漏字到文句颠倒，九年之间重印11次却始终未见修正。日前，一则新闻让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这部本该严谨权威的典籍，骤然陷入舆论漩涡。

古籍出版不是简单的“故纸堆翻新”，而是“为往圣继绝学”的严肃事业。此次曝光的错误绝非无关痛痒的笔误，而是触及古籍整理核心的专业性缺失。古籍整理需要校勘者具备扎实的文献学、训诂学功底，历经版本比对、文字校勘、标点审定等繁琐工序，容不得半点浮躁与敷衍。上海古籍出版社作为以古籍整理为专长的权威出版社，其“国学典藏”系列以“古书古注、横排简体”为特色，初衷是拉近现代读者与传统文化的距离，可当“典藏”沦为“错典”，传承的便不再是国学精华，而是谬误的种子。正如鲁迅先生曾警示的“今人标点古书而古书亡”，草率的古籍出版，不仅辜负了读者的信任，更是对文明传承的伤害。

一部古籍从整理到出版，本应经过作者点校、编辑初审、校对复核、质检把关的全链条管控，可这部《西厢记》却能带着大量错误重印11次，足见部分环节已形同虚设。无独有偶，在公众惊诧于《西厢记》谬误的同时，又爆出另一桩出版批漏——列入“语文课推荐阅读丛书”的《世说新语》，不过是两本百余页的小册子，竟检出至少30处编辑错误。2025年12月6日，中华书局就此作出回应，向各经销商发布了下架通知。一部典籍动辄数十处错误，难免引发读者质疑：连人名、年代等基础信息尚且错漏百出，更深层次的训诂与阐释，又何来可信度？

古籍是流动的思想江河，其生命力在于每一代整理者与出版者的敬畏之心。在弘扬国学的热潮中，古籍出版迎来了发展机遇，但也面临品质滑坡的风险。部分出版社为抢占市场份额，过度追求出版数量，却忽视了古籍整理的专业性与严谨性。更有甚者，一些整理者缺乏扎实的学术功底，仅凭拼凑剪贴便完成“点校”，把严肃的学术工作变成“文字搬运”。殊不知，古籍出版的价值不在于多而快，在于精而准。

中华书局整理的“二十四史”历经几代学者打磨，成为古籍整理的典范；上海古籍出版社早年推出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也曾以严谨细致赢得学界与读者的广泛认可。这些成功案例证明，只有以敬畏之心对待古籍，以工匠精神打磨品质，才能让传统文化真正活起来、传下去。

涉事出版社当以此为鉴，彻查出版流程中的漏洞，强化编辑、校对的专业培训与责任追究，建立“错谬追责”机制，让每一个环节都不敢掉以轻心；摒弃重规模、轻质量的浮躁心态，回归古籍整理的学术本质，给予整理者充足时间与空间深耕细作。古籍出版业也应加快建立出版质量标准体系，明确校勘、标点、注释的专业规范，通过行业自律与学术监督，遏制粗制滥造之风。监管部门则需加强对古籍出版的资质抽检与动态监管，对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出版物依法依规处理。

古籍是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国学热之下更要守住品质的底线，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审慎态度，对待每一部典籍、每一个文字，让古籍整理真正不负“传承绝学”的使命，让读者在准确的典籍中感受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 振钟

# 经典传承容不得半点草率

■ 孔德淇(广东)